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6.001

# 梁启超所做人物传记里的海洋英雄书写

## ——国家需要视角下的解读

陈 绪 石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2)

**摘 要:**在近代国家向海洋发展的大变局时代,梁启超确立了打造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理念,认为英雄在海洋国家建设中能够起到引导作用。国家需要是梁启超书写海洋英雄的原因,他在人物评传中建构中外海洋英雄群像。国家需要影响了梁启超的海洋英雄书写,他一是从国家层面阐述海洋英雄的成败得失,二是从海洋英雄书写中探寻能为近代中国所用的经验和教训。他的海洋英雄书写具有多重的现实意义,在学术和文学上也有一定价值。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当下,学者和文人不妨借鉴并超越梁启超,在海洋英雄书写的文学性和媒介多样性上进行更多的探索。

**关键词:**海洋英雄书写;海洋国家;国家需要;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K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6-0001-07

梁启超描摹了大量学术和文学价值兼具的古今中外英雄人物,多位学者研究过他的英雄群像建构。有人研究梁启超为什么要为英雄做传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梁启超的英雄人格使之与中外英雄共情,二是时代需要英雄。应该说,后一点更是梁启超重视英雄书写成立的理由。梁启超是“要通过传记这一形式来宣扬英雄身上所蕴含的创造、奋斗和抗争精神,以及那种理想主义的道德、道义的力量。这些精神都是当时的中国所缺乏和急需的”<sup>[1]</sup>。从深层次看,近代中国急需英雄及其精神,还与英雄史观有关。有的学者阐释梁启超复杂多义的英雄史观,注意到梁启超对于英雄与时势之间的关系有着丰富的表述,“梁启超用他那支生花妙笔,满怀炽烈的情感,高度礼赞英雄们自主自觉活动的意义和作用”<sup>[2]</sup>。其中,梁启超所描摹的这些英雄人物中不乏海洋英雄人物。针对梁启超的中外海上英雄书写,学者们主要论述了他的郑和研究,重要的论文有叶平的《近百年的郑和研究》和邹振环的《晚清航海探险史研究中的郑和》,二者都肯定了梁启超的郑和研究之国家现实需要价值。已有研究取得的成绩不小,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梁启超书写的海

洋英雄有讷耳逊、李鸿章、哥伦布、明清期间在南洋殖民的华人等,当前针对梁启超海洋英雄书写的研究基本上只涉及郑和;二是未详细论及梁启超海洋英雄书写的动机和学理;三是没有全面阐明梁启超海洋英雄书写的多重意义和社会价值。本文的论述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 一、国家需要是梁启超书写海洋英雄的起因

梁启超讲述海洋英雄的故事,弘扬他们的精神,研究他们的意义,有多种原因,根本原因是近代中国急切地需要海洋英雄。

梁启超书写海洋英雄,与近代中国向海洋发展的大变局分不开。在古代中国,从没有大一统王朝将国家发展的触角伸至海上和海外,所以,活跃在海洋之上的中国人通常不以英雄而是以天朝的弃民形象见之于史书。郑和是不多的例外,因为他被明成祖派往海外,一是寻觅建文帝下落,二是炫耀大明国威,引来万国朝贡,所以郑和下西洋被视作明初盛事。《明史》里的英雄郑和,与陆上帝国联系在一起,是怀柔远夷的使者。在近代,天

收稿日期:2023-09-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海洋文学理论研究”(20YJA751004);宁波文化研究工程梁启超建构的海洋学术文化研究(WH23-2-15)

**作者简介:**陈绪石(1968—),男,江西瑞昌人,文学博士,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朝的大门被西方殖民国家的“坚船利炮”所打开,海洋的价值由此被发现,海洋的地位急遽上升,“国家战略中心不得不向海疆转移”<sup>[3]</sup>。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的海防问题成为士大夫关注的议题,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此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也阐发过海防思想。甲午战争后,中国借鉴日本走向海洋的经验,士子文人的海权意识也日渐高涨,这体现在:一是西方的海权理论被传入中国并引起巨大反响;二是重要的启蒙人物如严复、梁启超开始论述近代中国的海权问题;三是在著名期刊如《新民丛报》《东方杂志》上涌现了大量讨论中国海权的文章。所以,国家向海洋进发是必然的大势,近代中国必须有海上英雄,其作用有二:第一,他们担当一面或运筹帷幄;第二,他们是标杆,能够带动更多的中国人在海上展示才华。或许,近代士大夫已经是事实上的海上英雄,如魏源撰有《海国图志》,李鸿章经营北洋舰队,容闳远赴美国留学,他们或以才华或以事业或以精神激励国民,堪为后来人在海洋领域建功立业的典范。不过,他们尚没有意识到海洋英雄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至少他们在海洋书写中未表述过这种想法。梁启超则迎合近代中国的需要,将诸多中外海洋英雄如李鸿章写入他的作品,宣扬他们的事迹和品格,以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进国家向海洋发展的目的。

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确立建设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理念,这是梁启超书写海洋英雄的直接动力。在古代,中原王朝以经营东亚大陆为本,海洋处于大陆的边缘,而近代中国在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被迫向海上发展,学习西方海洋国家成为普遍的潮流。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传播西方海国新知,在许多诗文如《20世纪太平洋歌》《夏威夷游记》《新大陆游记》等以海洋强国美日为范型畅谈国事,此时梁启超打造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理念得以明确形成。梁启超认为所谓海洋国家,就是充分、有效地利用海洋的国家。在海洋国家中,不仅政府官员大力推动国家向海洋要海权,而且民间也须有众多的国民勇在海外冒险、拓殖,欲建设中国为海国的梁启超必定希望中国有千千万万的海洋英雄开创海洋事业。海洋英雄并非都是直接在海洋上冒险或建功立业的英雄,有的英雄只是思考海洋问题就可称作海洋英雄,因此,海洋英雄既有观念上的,也有行动上的。

海洋意识有着无比重要的价值,古代中国士人和朝廷通常持重陆轻海观,这是华夏王朝在多数时候是大陆国家的根本原因,近代中国人须建构新海洋观、重视海洋经略,中国才有可能转型为海洋国家。在为国家和国民创建和塑造海洋英雄典范时,梁启超推介的是观念和行动上的两种类型的海洋英雄。

在梁启超看来,英雄在社会进步、文明演化、民族精神构筑等方面均能起到重要作用,他甚至不否认有时候是英雄创造历史,也就是他所言的英雄造时势。他很早就强调英雄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在《英雄与时势》一文中,他提出国家需要豪俊整顿乾坤。在《无名之英雄》中,受德富苏峰影响,针对中国的情势,他以为,“今日中国之所以不振,患在无英雄,此义人人能知之能言之,而所以无英雄之故,患在无无名之英雄”<sup>[4]364</sup>。其意是,大英雄需要无数的无名英雄成就其功业。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梁启超指出,英雄有一种精神力量,“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类,观其类而其民族之精神可见也”<sup>[4]366</sup>,国民须崇拜英雄,从英雄那里获得能量。英雄的作用如此重要,基于近代中国向海上发展的时势,国家需要各类海上英雄或造势或推高时势或做国民榜样。因此,他着力书写在海上驰骋和在海外建功立业的英雄,希望以此来充实民族的精神力,在英雄精神的引领下,国人应顺应大势,也应在海洋上做出英雄的大事业。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向海洋发展是时势,打造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理念是梁启超应时而建构的思想,海洋英雄在海洋国家建设中具有先导作用是梁启超所确立的认知,正是基于国家向海而兴的现实需要,他才萌生了书写中外海洋英雄的初衷。

## 二、国家需要影响下的海洋英雄书写

国家需要是梁启超书写海洋英雄评传的根本动力,这直接影响了他的英雄书写。在梁启超的作品里,这些中外海洋英雄或直接在海上建功立业,或提出极具影响力的有关海洋方面的思想理论,在海洋强国或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重大,有的英雄即便在当时没有能够推动国家向海洋拓展,但他们的海洋业绩和精神具有一定的价值,二者均可以激励近代国民勇做新时代的海洋英雄,有助于近代中国的海洋国家建设。因此,梁启超笔下的海洋英雄有成败两种类型,而成败

都是对国家而言的。

在1901年,梁启超撰写《李鸿章传》,认为李鸿章经略海洋有功,却未能实现推动国家向海洋发展,是失败者,主因是败在眼界与见识。从发文时间顺序看,李鸿章是梁启超较早讲述的海洋英雄。他为李鸿章做传,“将传主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更是自司马迁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时空。这种传记体裁开一代之风气,直到民国时代仍不断被人袭用”<sup>[5]</sup>。章立凡认为《李鸿章传》在史学方面和对李鸿章评价方面均有重要价值,然而,像其他人的《李鸿章传》研究一样,章立凡并没有论述传记的海洋主题。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是一位海洋英雄:首先,他在办理洋务方面颇有功绩,军事和商务方面的成绩与海洋有关,北洋舰队是一支有一定实力的近代海军;其次,李鸿章在见识上超过了一般人,他积极上书朝廷,筹划建造海船、加强海防事宜。以上所述即为梁启超的“敬李鸿章之才”,但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损失殆尽,梁启超以为李办商务有重大缺陷,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眼界不宽、见识陈旧。“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sup>[4]530</sup>从这段话推断梁启超的意思是:尽管李鸿章比之一般士人颇具见识,但其仍是旧式士大夫,因为他不了解世界发展大势,没有掌握近代以来的人类学问;从海洋角度看,李鸿章不知道人类文明进入太平洋时代,不清楚海国文明有胜势,他以为船坚炮利就是洋务的全部。所以梁启超断定李鸿章的失败,与他的眼界不宽、见识陈旧有关。梁启超惜李鸿章之识,一方面是为国家叹息,李鸿章是晚清王朝经略海洋的统帅,他的失败就是国家的失败;另一方面又为李鸿章惋惜,时代给他提供了改造国家的机会,然而因为个人和环境的原因,李鸿章的见识滞后,因而他错失良机。

与李鸿章和晚清政府的败北不同,美利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升格为海洋霸主,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赞赏美国海洋英雄马汉和老罗斯福为美国规划的海洋强国之路。马汉毕业于美国的一所海军学校,曾在海军服役,后来任职于美

国海军学院,讲授过海军史和海军战略等课程。职业经历对马汉思考海洋战略问题有着很大的帮助,他的海权理论自问世之日起就成为世界各海洋大国争相奉行的理论,在19世纪末美国跃升为全球性的海洋强国,马汉制海权理论的作用功不可没。老罗斯福年幼时对海军问题就很感兴趣,在1880年结识了马汉后,后者的思想强化了老罗斯福原有的海权至上信念。老罗斯福后来担任海军部副部长,任职期间致力于美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梁启超在北美大陆游历时,罗斯福为美国总统,推行美国为海上强国的路线图正在实施之中,因此梁启超的所见是:海洋新帝国正在强势崛起,意欲称霸太平洋。梁启超追溯美国海军发达史,“迨一八七〇前后,参将马韩氏(即马汉)大声疾呼,言经营海军之为急。(美国人之注意东方问题自马韩氏之著书始)然举国目笑存之,莫以为意也。一八八二年,卢氏(即老罗斯福)奉职海军省,著一书极言美国现在之海军,非旧式老朽之贻 tongue,即新造劣等之艨艟”<sup>[4]1162</sup>。老罗斯福以其言论推动美国重建海军,这为后来的美国试图称霸太平洋乃至全球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说马汉是理论生产者,是美国图谋太平洋霸权的始作俑者,“在一百多年前为美国的繁荣强大指明了方向”<sup>[6]</sup>,那老罗斯福就是理论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他们都是美国的海洋英雄。不同于李鸿章,马汉和老罗斯福都是成功人物。他们成功与失败背后的国家基础不同,美国的前身是英国的殖民地,本来就有海洋国家基因;而中国是大陆国家,欲转型为海洋国家,不是一个李鸿章能完成的,其实这也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

在海外冒险远航和开疆拓土的近代欧洲英雄,是梁启超不断书写的对象,梁启超赞赏他们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最早被梁启超称颂的欧洲海洋英雄是纳耳逊。梁启超称赞他的功绩,历经大小120余次的大海战,百折不挠,击败了法国与同盟国海军,使得地中海海权全归英国。梁启超以为,纳耳逊取胜的关键要素是其极强的荣誉感,这确保他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永不言弃。大航海英雄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是梁启超一再书写的人物,在《新民说》《夏威夷游记》《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等篇章中,梁启超讲述他们是发现新大陆、联通东西洋、开启全球化的英雄。他尤其看重他们的精神,指出:“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冒险进取之精神,殆其尤



要者也。”<sup>[4]667</sup> 因为勇于冒险,所以欧洲人在远洋航海和海外扩张方面屡建功业,强大的海洋国家不断涌现。

梁启超还为中国古代的海洋英雄作传,发掘历史上中华民族的闪光点。古代华夏王朝属于大陆国家,海洋英雄不多,即便有,也通常被湮灭不闻,或者是一种不寻常的历史存在。1904年,《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问世,梁启超交代作传的目的如下:其一,给不称于后世的英雄扬名,这几位传主的功业是在南洋取得短暂殖民的成功;其二,在古代,他们的作为在中国封建帝王看来是自绝于天朝的大逆不道,在近代,他们就是亮光,梁启超拂去历史的尘埃,以他们的事迹张扬大陆民族所缺乏的海洋精神。1905年,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在梁启超眼里,郑和的价值是航海,一是开辟新航路,二是远航历程长,三是航海时间久,四是所到之处多,五是海外经略有功。南洋殖民的英雄和郑和是中国史上难得的另类英雄,他们是边缘人物,但在近代,中国处于向海洋国家转型之中,尤其是梁启超持有打造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理念,扫去遮盖在上面的浮尘,他们就是闪闪发光的“金子”。

明清期间在南洋殖民的英雄以及郑和没有促成中国转型为海洋国家,又都是失败的英雄,梁启超分析了失败原因:明清时期的海外殖民华人一是不被后世所认可,二是他们的基业很快就遭毁灭。梁启超阐述了其中的原因:“列强殖民,莫不以政府之力直接间接奖励之,我国则如秦越人之相视肥瘠,甚或极诸其所往焉。夫是以虽有健者,终以援绝而败也。”<sup>[4]1368</sup> 这种没有后援的海外殖民,甚至遭到天朝打击的海外殖民,在西方殖民者的打压下必然遭到失败。由于他们是不安分的弃民,在主流史书里他们不可能获得赞誉。在梁启超看来,郑和航海看似成就斐然,实则并不成功,因为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即便有无数郑和,中国也不会演变为追求海权的国家。郑和航海不能改变中国,根源是“雄主之野心,欲搏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sup>[4]1550</sup>。迥异于西方国家航海的海外拓殖动机,作为大陆帝国,中国要的是四夷朝贡,帝王不知海洋在国家发展中所具备的重要价值,所以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就是“败在识见”。郑和航海之旅是大明王朝的宣国威之旅,国家得不到经济上的实惠,国土更不会向海外延展。

梁启超从国家层面阐述海洋英雄的得失成败,从中探寻能为近代中国所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梁启超笔下的海洋英雄包括成功者与失败者,区分的准则为他们的事业是否能够推进国家向海洋发展,能否使国家成为强大的海洋国家。哥伦布等航海、讷耳逊海战、马汉著《海权论》,在域外海洋强国崛起过程中,其伟业的功效有目共睹。梁启超书写这一类英雄,在《伟人讷耳逊轶事》里阐明了意图,“任事者可以鉴矣”<sup>[4]348</sup>。他号召国民学习海洋英雄的精神,勇于在海洋领域实现自身的价值,力助中国成为海洋强国。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海洋英雄的功业非比寻常,但他们都是悲情英雄,败北的责任或在朝廷,或在个人和朝廷。前者如郑和与明清期间在南洋殖民的华人,后者有李鸿章。失败的英雄并非完全没有可取之处,梁启超肯定海洋英雄的作为和精神,指出:“吾国若犹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则彼两省人,其犹可用也。”<sup>[4]1368</sup> 在南洋殖民做王的是粤闽两省人,近代中国欲为向海洋扩张的强国,他以为粤闽之人将大有作为。至于他所剖析朝廷和个人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中国未能转变为海洋国家的原因,是近代中国须规避的教训。海洋英雄书写着眼于功用,这充分体现了国家需要影响了梁启超对海洋英雄的建构。

### 三、梁启超海洋英雄书写的多重意义

在谋求向海而兴的近代中国,梁启超的海洋英雄书写对近代中国海洋文化建设的滥觞有着三点直接的现实意义。

现实意义一:海洋国家须具备海上硬实力和海洋文化软实力,海洋学术和海洋文学均为海洋文化,是海洋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积极书写中外海洋英雄,其功用有:在中外海洋英雄事迹的讲述中突出他们的功业在国家海洋建设中的价值,张扬以海兴国的观念,增强中国走向海洋的“向心力与凝聚力”<sup>[7]</sup>,实现国家海洋软实力的提升;以海洋英雄书写的方式踊跃参与海洋国家建设,打造匹配海洋国家身份的文化,起到为近代中国向海洋国家转型提供海洋文化支撑的作用。

现实意义二:梁启超弘扬英雄的精神、张扬他们的业绩,为国民确立新的时代模范,促使更多的国人在海洋领域建功立业。他推崇海洋英雄,讲述他们的事业及其作用。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

传》中他说：“西纪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欧沿岸诸民族，各以航海业相竞，时则有葡之王子亨利（Don Henry），献身海事，既发大西洋附近砵仙图群岛（Port Santo）、挨莎士群岛（Azores）、加拿里群岛（Canary）。未几哥伦布遂航大西洋，发见西印度群岛，前后四度，遂启亚美利加大陆。同时葡人维哥达嘉马（Vasco Da Gama）沿亚非利加南岸，逾好望角，达印度，回航以归欧洲（一四八六至一四九七年）。越十余年，而葡人麦折伦（Magellan）横渡太平洋，启菲律宾群岛，绕世界一周（一五一九至一九二二年）。自是新旧两陆，东西两洋，交通大开，全球比邻，备哉灿烂，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也。”<sup>[4]1545</sup>这段话揭示了航海实则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外扩张的必要起始，后来它们试图瓜分全球的海洋，因此，在这两个国家的海洋帝国史上，航海家居功至伟。与西班牙、葡萄牙不同，英美能够获取海洋霸主地位，海上战争是不二法门，它们的英雄是纳尔逊、马汉、老罗斯福等。以上所述表明，梁启超认为：在海洋强国的打造过程中，海洋英雄是引领者、中流砥柱；中国若要转型为海洋国家，海洋英雄必不可少。梁启超突出海洋英雄的精神、品格，如纳尔逊的荣誉感、航海英雄的冒险精神、老罗斯福在海洋领域的长远规划等，这些作为成就了他们的海洋事业。海洋英雄以其精神和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范型，“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追求”<sup>[8]</sup>，在国民人格的塑造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以为李鸿章是孤独英雄，他悲叹道，“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右”<sup>[4]531</sup>。近代中国急需千千万万的海洋英雄，他们应该成为李鸿章等人的强力后盾，是国家海洋经略取得成功的有力保障。

现实意义三：梁启超以失败英雄的书写批判中国封建帝王的天朝大国意识，这是近代中国须汲取的教训。古代帝王的天朝意识来自中原帝国的认知，华夏是以中原区域为统治核心的王朝，以中原王朝自居就意味着各王朝只注重守护东亚大陆，对海外四夷只具有鄙视之意，所以古代中国是大陆国家，各王朝几乎不图谋成为海洋国家，持天朝上国意识的明清帝王打压海外华人在南洋的殖民。在《中国八大殖民伟人传》中，梁启超抨击这些帝王的胡乱作为。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他批评明成祖仅有怀柔远人的虚誉，而无向海外开疆拓土的雄心，这使得郑和远航没有能够改变历史。以古人为镜鉴，近代中国如向海洋国家

转型，不仅需要众多的海洋英雄，朝廷或者政府更须改正以往的错误，要有经略海洋的意图，支持英雄在海外的冒险、拓殖。梁启超的看法还算合理，他认为：近代以来，海外扩张是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大势，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等相继成为海洋霸主，邻国日本也走上以海强国之路，固守在东亚大陆的大清王朝则日趋没落。因此，融入世界潮流是中国的必经之道。但晚清王朝并没有拧成一股绳，力求国家向海洋发展，上层的反对势力强大，魏源的《海国图志》未得到普遍认可，北洋舰队的军费经常捉襟见肘，朝廷和重臣们多次拒绝拨款，因此，梁启超在英雄传记里对朝廷所做的批判就显得颇具现实意义。不过，在国家如何复兴的问题上，梁启超完全以英美日为范型、照搬西方海权理论的作为并不可取，因为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大陆性特征极强，所以，梁启超在宣扬海洋意识的思想体系中尚缺乏针对中国自身特点的具有个性化的论述。

梁启超的海洋英雄书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他运用海权理论解读中外海洋英雄。《新民丛报》中不乏讨论海权的文章，在《新大陆游记》中，他提及马汉其人和其学术思想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意义，这说明梁启超熟悉海权理论。马汉以为，一个海洋国家的海权由六大要素构成，国民的海洋冒险和海外拓殖是重要的一环，因此，梁启超书写海洋英雄，重视英雄在国民海洋作为中的引领作用。在英雄书写中他分析明清帝王的负面影响，这在海权理论中也有出处，马汉认为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的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这一点看起来是很有可能。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意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至<sup>[9]</sup>。政府是海洋国家的海权构成要素之一，马汉从西方海洋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海洋强国不仅需要国民在海洋上冒险，而且，政府也须支持、赞助国民的海外拓殖行动。梁启超对中外海洋英雄做了对比性的解读，发现了如下问题：西方海洋强国政府乐于扶持民间海外冒险活动，而明清王朝非但不支持而且还压制华人的南洋殖民行为，郑和远航也不具备海外拓殖的内涵。梁启超作《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并非用来“深入探讨了英雄、民众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sup>[9]</sup>，他强调，郑和之后即便有无数



“郑和”也无济于事,关键原因是封建帝王们无意于向海洋推进,因此,梁启超探讨的是海洋英雄、明朝廷和国家发展的关系。梁启超还为在陆上开疆拓土的英雄作传,这是他受马汉海权理论影响而进行学术研究的又一例证。“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sup>[10]234</sup> 海洋国家活跃在海上,需要广袤的内陆做依托,所以,梁启超写有《张博望班定远合传》,讴歌二者开拓、经营西北边疆的业绩。总之,他从海权理论角度论析古代中国未能演进为海洋国家的原因,论题重大,具有前沿性,还传播了西方海权思想,因为海权理论在1900年前后传入中国,梁启超以新文体的形式极大地普及了前沿学术,这就是梁启超进行海洋英雄书写的学术价值。

梁启超的中外海洋英雄书写尚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他的海洋英雄建构,多为综合性的学术评传,如《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李鸿章传》《八大伟人传》等。由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多运用非文学手法,概述、分析、论述等是主要方法,因此这些文本并不是纯文学文本,故事性、形象性不强。比如,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梁启超列举郑和七次航海的史实,并罗列他的所到之处,以证实他是伟大的航海家。不过,传记里偶尔也有简单叙述且具有一定文学性描述的语句,一个勇于冒险、乐于航海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再如,在《伟人讷耳逊轶事》中,梁启超讲述了幼年讷耳逊爱惜荣誉一事,揭示了英雄的性格特征,从中窥探讷耳逊在海战中取得成功的经验。梁启超在学术评传里书写海洋英雄的作品算不上是纯粹的文学文本,文学性较弱,这与他的写作目的有关。创作的功利性在文学作品《20世纪太平洋歌》《夏威夷游记》里也有突出表现,梁启超或宣扬“20世纪为太平洋世纪”新学说,或彰显冒险的海洋精神,前者呼吁中华民族涌向海洋、经略太平洋,后者倡导冒险、创新精神,强烈的功利性削弱了这些文本的文学性。如果说文学英雄的建构有两个逻辑,“一个是审美的逻辑,另一个是教育的逻辑”<sup>[11]</sup>,那么在梁启超的海洋英雄传记里,教育逻辑完全压倒了审美逻辑,激励国民甘做海洋英雄是他书写的主要目的,他不在乎传记中是否具有文学性。但梁启超的海洋英雄书写仍不可被忽视:一是英雄形象并非完全没有文学性,二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他首次建构了海洋英雄群像。

梁启超的海洋英雄书写,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当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更须被超越。第一,应时代之需他建构了海洋英雄群像,当今的文人学者如有意愿不妨学习梁启超。像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一样,中国当下正在推行海洋强国战略,涌现出各类海洋英雄,他们本来就是文学再现和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且,以海洋英雄书写的方式播撒英雄精神,国民的人格在时代潮流中能够得以被重塑,这有利于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建设,是建构海洋英雄的功利逻辑。第二,加强文学上的海洋英雄书写,“回到生命本体和文学本身的英雄叙事”<sup>[12]</sup>。基于近代中国的现实需要,梁启超以学术评传的方式书写海洋英雄,对其进行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尽管梁启超以其特别的文体增强了文本的文学性色彩,但与纯粹的文学作品相比,研究类书写在大众中的影响力仍然较小。所以,从广为传播英雄事迹、传扬英雄精神和服务于国家的角度看,文学领域方面的海洋英雄书写应多多益善,建构丰满人物形象尤其必要。第三,除了文学和学术上的文本,海洋英雄的讲述可运用多种媒介,如可以延展到影视领域。在这一方面,史上偶见尝试者。在1941年,阿英创作的4幕历史话剧《海国英雄》,反响较大,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事迹在抗战时期释放出鼓舞人心的巨大能量。郭沫若在1962年创作电影剧本《郑成功》,“海洋英雄是郭沫若对郑成功的重新认识和文学再现”<sup>[13]</sup>,遗憾的是,剧本在当年的影响不大,实为生不逢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搬上荧屏的海洋英雄逐渐增多,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当前的影视剧本写作者有着良好的外在条件,大力宣扬海洋英雄的事业和精神恰逢其时。

### 参考文献:

- [1] 俞冰. 试论梁启超英雄传记之产生渊源[J]. 学理论, 2014(6).
- [2] 李宝红. 梁启超英雄观辨[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2).
- [3] 郭渊. 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2(3).
- [4]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5] 章立凡.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J]. 江淮文史, 2010(1).
- [6] 杨震, 周云亨. 论海权论的进化及新世纪美国海

军的转型[J]. 太平洋学报, 2010(12).

[7] 孙波. 文化软实力及其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J]. 科学社会主义, 2008(2).

[8] 潘天强. 论英雄主义 ——历史观中的光环和阴影[J]. 人文杂志, 2007(3).

[9] 曹小文. 新史学: 20 世纪前后中国人心中的世界史——试论梁启超的世界史观[J]. 学术研究, 2016(2).

[10] 马汉. 海权论[M]. 萧伟中, 梅然, 译. 北京: 中国

言实出版社, 1997.

[11] 寇鹏程. 新中国文学塑造英雄形象中心任务的确立及其书写逻辑[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

[12] 青屏. 英雄书写的“当代性”[J]. 长江文艺评论, 2017(6).

[13] 寇淑婷. 郭沫若《郑成功》中的海洋书写及其“哲学意味”[J].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2(2).

## Maritime Heroes Writing in the Biographies Created by Liang Qichao: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Needs

CHEN Xushi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2, China)

**Abstract:** In the modern era of great change in the nation's development toward the sea, Liang Qichao established the idea of building China as a maritime nation, thinking that the heroes could play a gui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nation. The nation's need was the reason for his writing of maritime heroes, and he constructed the images of a group of Chinese and foreign maritime heroes in his biographies. The nation's need influenced his writing of maritime heroes. He elaborated on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maritime hero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n explored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that could be used by modern China from his writing of maritime heroes. His writing of maritime heroes has multipl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also has a certain value in learning and literature. At the time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maritime power”, the scholars and literati may as well learn from and surpass Liang Qichao, and carry out more exploration in the literariness and media diversity of maritime hero writing.

**Key words:** maritime hero writing; maritime nation; national need; Liang Qichao

(责任编辑 雪 箫)